

恕我开门见山，开门就出题：你读的翻译小说、文学翻译作品，你认为那是外国文学还是中国文学？我猜想，多数人都不会假思索回答：当然是外国文学喽！甚至可能出声或不出声地嗔怪说，瞧你问的什么！然而有一位先生说：“不，翻译文学属于中国文学。”这位先生就是去年去世的沪上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先生。

先生开创了“译介学”。上外大副校长查明建教授认为先生的专著《译介学》“首次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作者从翻译文学的性质、地位和归属等方面，从理论上论证了翻译文学与民族创作文学的关系，明确了翻译文学的文学地位，提

一位令人怀念的沪上学者

林少华

出了“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学术命题。”这意味着，以《挪威的森林》为例，倘以日文读其原著，那么你是读日本文学、外国文学；而若以中文、以拙译读之，则是读翻译文学，而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如何？观点前所未见吧？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的区别因此得以厘清。在此之前，别说一般读者，即使学界也往往混为一谈。

实际上先生也曾把把这个观点用在《挪威的森林》批评上面。时间倒退十几

年，2009年樱花时节，先生来青岛参加“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一见面就拉起我的手说：“你译的《挪威的森林》、译的村上小说，他们批评得不对，个别误译谁都无法避免不了，重要的是要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方面来分析看待……”不是我趁机翻旧账，大约从2008年的年底开始，忽然刮起一股批评拙译村上作品的旋风，指责“美化”者有之，冷嘲热讽者有之，大呼上当者有之，国外甚至有人说是“汉语沙文主义”。当时我还没



音乐会（油画）唐嘉骏

光绪二十二年，《清史列传》薛允升本传记载，这年四月，“太监李荃材、张受山等纠众逞凶，杀伤捕人，上谕刑部照康熙年间谕旨，从严定议具奏”。这就是史称的“丙申太监肇事庆和园案”。这些太监依仗自己是宫里的人，无比张狂，先是结伙在大栅栏内庆和戏园“纠众逞凶”，后又在执法者赶来处理时，挥舞刀棒“杀伤捕人”。拒捕和暴力“袭警”导致多名执法者受伤，队长也不幸死于太监张受山刀下。光绪皇帝当即命刑部尚书薛允升对上述太监主持审讯。审讯依据康熙、道光两朝关于严禁太监出宫饮酒听戏、犯罪重治的谕旨进行。《清德宗实录》记载，经过审讯，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联衔具奏：“太监李荃材、张受山均拟斩立决，同谋葆范、范连源均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他涉案太监，拟分别流放边陲。

不料这份奏折呈上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疏入，上以仍系请旨办理，语涉含混，著拟定罪名，再行具奏。”这里的“上”系指光绪。原本对于“纠众逞凶，杀伤捕人”的太监嫌疑犯，属下就是根据光绪指示“刑部照康熙年间谕旨，从严定议具奏”予以执行的。但光绪却突然没了先前的底气，竟含

混地说他还要“请旨办理”，并指示属下对所判决对象“拟定罪名，再行具奏”。光绪“请旨”的对象，显然只有慈禧。原来这一切的幕后，是因为有深得

无可遁逃

陆其国

慈禧信任的太监大总管李莲英在活动。后者四下请托，自己又在慈禧面前一再乞恩，慈禧因此干预此案判决，以致光绪迫于慈禧的淫威，只得压下“三法司”奏折。

薛允升知道光绪的无奈，但他还是毅然上书陈言：“臣等为执法之吏，不敢擅自从轻（判决）；……从犯或可稍宽，首恶断不

可纵。是于钦恤之中，仍寓严明之意。皇上慈祥为念，一时不忍骈戮二人，请将张受山一名立即处斩；李荃材仅止伤人，究未杀毙，似尚有一线可原，量减为斩监候。”

不难看出，薛允升这份上奏既有坚持，也有妥协。妥协的是“从犯或可稍宽”；坚持的是首恶不可放纵，必须严惩。正是鉴于薛允升既有妥协，又有坚持的立场，让“上”知其执法不挠，卒从其议”。这里的“上”既指光绪，也指慈禧。尤其薛允升在上奏中说：“太监与平人（平常百姓）不同，我朝家法甚严，凡所以整饬寺宦者，无不加倍治罪，亦深恐一时姑息，异日或致养奸。此防微杜渐之深心，实寓成全之至

在我年幼的认知中，对中共隐蔽战线地下党的印象，或许就是来自他们：面对敌人，智慧、果敢；面对情感，克制、隐忍；风暴来临，总能九死一生、化险为夷；严峻考验面前，亦能从容别离、牺牲小我。那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还不能真正理解生死，却已感受到震撼。

我们爱看谍战剧，大概是因为“帅”。

这“帅”可不是外表的，在许多谍战老剧中，地下党看上去都平平无奇，甚至不修边幅，就是最普通的厨子、铁匠、买烟小贩、铁道工人……可他们经历的一回回惊心动魄、与敌人的一次次“智斗”、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的一个奇招，构成了我最初的“爽点”。在我儿时朴素的世界观里，他们就是英雄的“代名词”。《沙家浜》中智斗伪军的阿庆嫂、《红灯记》里忍辱负重、完成任务的李铁梅，全都是“偶像级别”；《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英雄虎胆》中的曾泰，

这些深入敌巢、亦正亦邪的孤胆英雄，更是“帅得冒泡”，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做游戏，谁不想“扮成”他们？哪个不会来几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近十多年来，影视剧中的地下党形象一个个也帅。《伪装者》的明氏三兄弟、《麻雀》里的陈深、《黑狐》里的方天翼、《秋蝉》里的叶冲……抗战谍战剧要赢得一席之地，光靠旧模式和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肯定不行。于是，融入了剧情、武侠、间谍等多种类型，让主人公的“情感线”丰富起来、外形醒目起来、能力复合起来，成为贴着“地下党”标签的剑侠、谋士与翩翩佳偶。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不少；网络评分也参差不齐，但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收视率不错；不仅能为母亲这样的老“忠粉”接受，而且在年轻人中也颇有观众缘。

有觉察出其中的非学术批评因素，深深陷入困惑和痛楚之中，就好像在莺歌燕舞的花坞，忽一下子掉进了夜幕下冰凉的漩涡。借用村上式幽默，简直就像全世界所有的电冰箱一齐朝我大敞四开——就在我冻得瑟瑟发抖四顾茫然的时候，先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不过那时我还没意识到那是先生的“译介学”观点所使然，而认为是出于学者的公允之心和正义感。显而易见，这一观点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信达雅”之说，同抓住一两处误译就如获至宝叭叭说个没完甚至百般奚落的所谓批评相比，更是迥异其趣，高下立判。

谢老师的另一贡献，就是为中国翻译学科的创建与发展身体力行奔走呼号。记得2017年10月来我校讲学时，主持者任东升教授要我点评几句，我想了想，对满满一会场的翻译硕士生缓缓说道：“大家今天之所以能考进这里坐在这里，应该感谢谢老师。假如没有谢老师和他的同事多年来不屈不挠的努力，翻译学科的建立就不会这么快得到认可和批准……”掌声四起，男生女生把热诚的目光投向谢先生。刚刚坐下的先生起身致意，露出个无腴腆的微笑。是的，我说的并非场面上的套话，而是肺腑之言，是事实。一个人创立了一门学说，又把这门学说付诸实践，进而促成一个学科的建立，这个贡献，无论如何都是了不起的贡献。既是学术贡献、学科贡献，又是社会贡献。

也巧，很少和先生相见的我，两个月后又见到了先生。当时我做客上外的演讲，先生特意赶来请

意见。”

面对薛允升据律力争，言之有理的陈辞，慈禧内心再怎么不爽，终究也不至于为几个犯罪太监，公然和大清的律例叫板。最后只能同意对杀死执法队长的张受山执行死刑，李荃材改判为“斩监候”，秋后列入“缓决”（死缓）。其他罪犯依议流放。作恶的太监最终无可遁逃，这也是他们罪有应得。

不过坚持秉公执法的薛允升，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就在距判决上述

炒面
我爱吃炒面。
上海广州两地炒面不同，我爱的是广州炒面。

上海炒面两面黄，广州炒面一面黄，松松软软很好吃，不像上海炒面那么油腻。

在广州上茶楼饮茶，吃点心后往往来一碟炒面，韭黄炒面，细豆芽炒面，很过瘾。



我去研究室喝他亲手调制的咖啡，又小心找出精美的糕点，让我连吃带喝。言谈举止是那么热情，甚至带有几分少年般的激情和纯真，使得研究室极普通的桌椅也好像有了鲜活的表情。老实说，咖啡如何，我这个乡下人喝不出什么名堂，但糕点确实够味儿。加之摇唇鼓舌之后有了口腹之欲，一般不吃零食的我一连就着咖啡吃了好几块。由于晚上还有活动，我谢绝了晚宴美意。告辞时，他从书橱抽出一本他参与编写的北大版精装学术论文集，有一篇是北大项目组写我的翻译的，着重剖析了开头说的那场“林译”风波背后商业操作的来龙去脉。先生说 he 手头只有这一本了。这是一本对于我特别重要的书，我自己却完全不晓得，而先生题签送给了我……

先生走了，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先生是萧山人，本科时代研究生时代和职业生涯都在上海、上外大度过。2020年4月26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他是一位令人怀念的沪上学者！谢天振先生千古！

案件不出一一年，薛允升也“无可遁逃”地被“上”以其在处理其他公务时“不知避嫌”，“降三级调用”。于是薛允升干脆托病辞官，携家人回到陕西老家。

吊诡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带着光绪西逃。面对北方乱局，不知出于何因，慈禧忽又想到起用薛允升，让他官复原职。薛允升以自己年老为由请辞，但慈禧“不允”——此堪称是“无可遁逃”的一个黑色幽默。

“融合”的不仅是风格，更有剧本。新的故事结构和讲述方式丰富了谍战剧的层次，更提升了节奏和内涵。通过将一个个“闯关式”任务衔接起来、相互渗透，新谍战故事不仅具有了扣人心弦的情节、探秘解密的紧张感，而且人物刻画得相当丰满，在“收视”可观的同时，无心插柳柳成荫，打造了一批“新经典”，如《潜伏》《黎明之前》《悬崖》等，都是其中的典范，由它们塑造的一批地下党形象：余则成、王翠平、刘新杰、周乙……令人过目难忘、津津乐道。而这样的剧，在母亲这种老“忠粉”眼里，也更有吸引力，每一部她都刷过N遍；每每遭遇“剧荒”，全靠它们。

不过，新谍战剧虽说形式大变样，其实内核没变；“新剧”的地基和大梁都是“老剧”打好的，地下党员的精神品格

炒面、蒸糕与腊肠

任溶溶

这些蒸糕也成为广州著名点心，大家到广州一定吃到过吧？

腊肠
我小时候吃的腊肠，都是母亲亲手制作的。她知道我不吃肥肉，就做出精瘦的腊肠。

一根腊肠，我和弟弟一顿饭。像我母亲制作的那么瘦的腊肠是买不到的。除了肉腊肠，还有肝肠，过去杏花楼也能买到。

大丽花的另一个名字叫西番莲，可见是个洋种。但其实，“大丽”也是洋名，是一位瑞典植物学家的名字Dahlia的音译，据说这位大丽博士是伟大的分类学家林奈的学生。大丽花的祖籍在遥远的墨西哥高原，性喜干燥凉爽，在外游子，有时候面对眼前的景致，会有“村桥原树似吾乡”之叹，大丽花一定是喜欢上了中国东北的空气，便落下了脚。

每年一入夏，北方的街头巷尾，大丽花便纷纷登场了。白、粉、红、黄、紫，十来种颜色，花有重瓣的，也有单瓣的，似菊非菊。母亲家楼下的花坛里，每年都有几丛，和鸡冠花、江西腊、金鱼草、一串红、波斯菊这些“国民草花”一起，姹紫嫣红着，直到秋凉。

我很小就知道大丽花，是因为有个佟姓邻居，擅养花草，大丽花便有好多盆。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佟叔叔家的大丽花颜色多，而是他的绝活。每年霜冻前，他会割去大丽花的茎叶，然后把像甘薯的块根一坨坨包好，装入纸箱，再填上细沙，放到厨房的角落。那时候住房条件不佳，四合院的厨房，冬天的温度零度左右。开春，他把休眠了一冬的大丽花请出来，左手持块茎，右手一柄小刀，确定有叶芽的位置，将其分为数块，这架势颇像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然后涂以事先准备好的草木灰，入盆，浇水，佟氏大丽花家族日渐壮大。

多年以后，读恰佩克的书，一个园丁在漫漫冬季，满脑子都是对即将到来的春日劳作的排演与遐想，佟叔叔一定和恰佩克一样，把他的大丽花想了无数遍吧。

南方的温度，对大丽花不够友好，它多少有些水土不服，花市上虽也常见，总不及在北方那么繁茂茁壮。有一年买了两盆，夏日勤搬动，免得暴晒，开得不赖。但到了冬天，佟叔叔的本事我可不具备，只能放在阳台上，孰料温度高，叶子不落，春节居然再次开花，花轮比夏花小了一半，颜色还好。可惜这是一次代价太大的绽放，不到夏天，便一命呜呼了，盖养分耗尽矣。是故，人也罢，植物也罢，凡违背规律，必无善果。

大丽花其色之繁，为花中翘楚，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据说世界各地的园丁们，至今还在进行杂交繁殖，种类在持续增加，不过，美常常也有欠缺，大丽花没有香味儿。记得当年佟叔叔就非常遗憾地和我提起，他听说，国外有人在“攻关”，用其他的什么花来给大丽花授粉，要是中国人能实现这个，就好了。我后来读贾祖璋先生的《花与文学》，得知美国园艺学家蒲班克二十世纪初便立志改良大丽花没有香味儿这一美中不足，最后似乎有所收获，育成了若干个品种的芬芳大丽花，可是，这些花的大小、形态、色彩均不佳。

遗传学著作《植物的欲望》中说，花的形状、颜色以及香气，其实承载着人们在时间长河中的观念和欲望，也就是说，是人塑造了花。我想说，大丽花，别在意蒲班克先生的执念，你就是你，一朵花，只能做一朵花的事情。

“万变不离其宗”。就说《潜伏》，余则成和王翠平假扮夫妇的“桥段”，正与《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和何兰芬一脉相承；无独有偶，《黎明之前》的刘新杰和顾晔晔，《麻雀》中的唐山海和徐碧城（这对不是共产党，但也是与地下党联手抗日的）都是如此。李侠的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又被由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用在了女地下党员顾晓梦的身上。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那无线电台的“滴、滴”声，成为这些“后来者”永不消逝的“主旋律”。

意犹未尽。我又问母亲：“这么多谍战剧，您最喜欢哪一部？”对于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就没那么干脆了，而是苦思冥想了好久，才叫结道：“说不好，都喜欢！”

十日谈

影视中的共产党员

责编：杨晓晖

时代变迁，信仰没有过时。

